

打破西方選舉迷思 選出賢能愛國者



近日，近千名選舉委員到全港各區，以擺街站、家訪等方式與市民近距離接觸。9月19日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第一場選舉，意義非凡。完善選舉制度，可謂顛覆了西方傳統上對於選舉的認知。西方普遍認為，勝選的慾望可以推動候選人接觸群眾，所以他們認為選舉愈激烈，候選人落區的動

力就愈大。然而，香港證明了選舉不是可口可樂，不一定要全世界同一種味道，最重要是符合社會實際情況。完善選舉制度開拓出一種適合香港的選舉制度，除了選票之外，更重要的是愛國和賢能。候選人必須是愛國者，而且賢能，才可以滿足「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雖然有多位選委已經自動當選，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已經完成工作。反而，他們繼續熱心落區聽意見，這種幹勁就更加難得了。他們用行動說明了候選人不一定要選舉才落區。民意代表勤力工作、真誠為民，這並非一定是選舉的壓力所推動，而是他們本身有沒有責任感的問題。

西方政客淪為演員

西方選舉模式只講選票，勝者為王，於是當選者就認為自己有民意授權，在位期間就可以為所欲為，有些西方的政治領袖甚至可以做出一些違背他們國家人民利益的事情。因此西方這種選舉制度並不保證可以選出賢能的人，

只能選出知名度高、受歡迎的人。久而久之，這樣的選舉難免淪落到跟選美差不多，西方政客則往往淪為演員。這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民主應該是「從眾」還是「從賢」的哲學問題。而西方現代民主最大的問題就是選票說了算，完全忘記了民主選舉是要選賢任能的初心。

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於《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深入探討了一對矛盾問題，就是如何在一個「從眾」的選舉制度下選出賢能的人去治理美國，從而令到國家和政府都穩定。他發現民主制度很容易被一小撮利益群體操控，認為必須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他於兩百多年前提出這個問題是相當前衛的，但他的答案是把共和國的規模擴大、把選民基礎擴

大。麥迪遜的答案有兩大缺點：第一，麥迪遜的思想會導致擴張主義，打着民主的旗號去侵略別國，而在他任內就爆發了美軍入侵英屬加拿大的1812年戰爭；第二，今天的美國不論性別和種族，早已是一人一票，但仍然可以選出特朗普這種質素成疑的總統。這就說明只是增加選民人數並不足以選賢任能，必須有其他的機制去確保一個選舉制度既「從賢」也「從眾」。

擔當使命解決民間疾苦

坊間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麼完善後的選舉制度是一種進步，這是由於問題本身就具有哲學性。「從賢」和「從眾」這對矛盾問題其實可

以運用辯證法去理解。首先要明白選舉的目的是選賢任能，不然選舉只會淪為一種娛樂或發洩，對於社會發展沒有好處。立足於「從賢」的基礎上再添加選舉的元素，香港的新選舉制度正是走這種路線，先確保候選人都是賢能的愛國者，之後才讓他們爭取群眾的支持。

因此，他們絕不會因為自動當選而了事，而是要不負賢能愛國者的稱號，接觸群眾、了解民間疾苦，從而向政府提出好的建議，幫助政府施政。更何況有些席位不是自動當選，那就需要更大的努力了。可以說，香港的新選舉制度是回到民主選舉選賢任能的初心，把「從賢」和「從眾」這對矛盾問題辯證地結合起來，為市民謀福祉。

商界選委要肩負社會擔當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即將於周日舉行，是全國人大通過落實完善本港選舉制度後的首場選舉，對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促進香港政制穩步發展意義重大。新選制強化了社會各階層的參與，有利吸納更多不同界別精英，充分體現「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原則。事實上，本港不少工商界人士除專注業務經營和工商經貿發展外，在其他不同的社會民生領域亦有廣泛參與，今次選委會增加了多個不同界別範疇，無疑讓工商界能通過更多元渠道參與政府施政議政，發揮更大功能，肩負起更大責任與承擔。

面對新冠疫情及環球政經局勢種種不確定性，全球以及香港經濟發展充滿挑戰。香港

國安法出台及完善選舉制度，讓香港進入由亂到治新里程。「十四五」規劃進一步明確香港長遠發展方向，香港必須加快步伐，在新時代新格局下抓緊歷史新機遇。

商界選委要致力推動業界鞏固及提升各個產業的自身優勢，引導業界推動南金融、北創科發展格局，更好地配合大灣區發展，並充分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強化香港工商業競爭力。業界也要加大創科資源投放，善用河套區發展，將新界北打造成香港「小砂谷」，並積極參與前海、橫琴等最新發展布局。

要推動香港有效融入大灣區和國家發展，當中關鍵是要就現時一些規則限制拆牆鬆綁。有許多市民期望，香港與內地要

盡快通關，讓彼此經貿與民生往來回復正常。特區政府要與內地加強溝通，逐步有序恢復兩地經貿與人員正常往來，讓香港工商經濟重拾動力。

本港一定要建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才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各界別包括商界選委一定要以此為依歸，選出真心為港、做實事的治港者，全力維護香港國安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商界選委要促進業界善用內地和國際的人脈網絡優勢，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和「一國兩制」故事，同時亦要關心青年、社會民生發展，為構建繁榮穩定香港、配合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前海方案」機遇藏於挑戰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全國青聯委員

有人擔心，香港的企業和專業人才落戶前海後，或令香港流失人才。

「前海方案」的重點是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加快在前海建立與香港聯通、國際接軌的現代服務業體制。筆者認為，從深圳角度而言，深港合作是前海發展重點使命；但從香港角度來說，當局應先認清自身發展現況及經濟模式長處，並把握前海作為深港合作主要載體的制度創新平台，透過規則銜接，發揮如國際金融、航運、高端專業服務業等優勢，主動與前海錯位發展，以促進兩地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發揮「1+1>2」的「雙引擎」功能。

先行先試三大領域

「前海方案」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先行先試，打造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筆者認為，其主要為三大領域行業帶來利好發展因素：

一是金融。「前海方案」多次提及「金融」兩個字，尤其提到要支持將國家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政策措施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反映中央對有關行業的重視，

以及利好香港金融業的長遠發展。

二是創科行業。「前海方案」表明，要加快科技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聚焦人工智能、健康醫療、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物聯網、能源新材料等港澳優勢領域，對推動引領產業創新的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具有重大意義。

三是專業服務領域，如「前海方案」提到，要提升法律事務對外開放水平，建設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及「探索完善前海合作區內適用香港法律和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案件的機制」等。

過去十幾年，前海的定位一向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吸引青年創業、專業服務落戶，銜接香港並促進兩地融合，「前海方案」可說是2010年前海規劃的升級版延續，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及大灣區發展機遇下，進一步銜接內地與香港制度及開放專業服務業的重要舉措。香港應把握機會，用好「一國兩制」優勢，積極參與推動前海服務業發展，否則就如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所說：「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



中央政府日前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將前海合作區域面積擴大至原本的八倍。港深雙城合作發展並非新鮮事，但方案一出，各界紛紛對香港的角色進行熱議，香港到底只是「從旁協助」，還是可與前海齊發展？

筆者認為，「前海方案」是香港與前海間協同發展新階段的機遇，把握得好，可為香港發展注入新動能；但如果錯失機會，恐怕會被競爭對手拋離。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具備長遠發展戰略思維，與灣區城市於競爭中協同發展。

錯位發展「1+1>2」

仔細對比「前海方案」與「橫琴方案」，不難發現，香港和澳門在其中的角色有所不同。後者的定位以澳門為主體發展，強調由粵澳雙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即由粵澳聯合組建「合作區管理委員會」並共同履行主體責任；但前者則與過去的管理模式基本一樣，主要由深圳主導前海的開發管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會

國家「教育雙減」的深層意義

何杏研 公共政策分析員

能力在現今中國教育制度中仍然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成就了專門以應試為導向的校外培訓，即補習班。然而，在現今社會，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巨大變化，學校已不能只限於「知識傳授」，以往「唯分數」的教育模式已不合時宜，擁有合適的技能及觀念更為重要。因此，學校和教師要啟發學生主動學習和探索的能力，培養綜合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能力，這才算是高質量的教育。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中央政府對校外培訓機構培訓行為全面規範，並不代表考試不重要，公開考試是一個較客觀及公平的參考，同時是不少窮苦家庭出身的學生改變命運的途徑。因此，如何讓每個學生在較為均衡的基礎上發揮個人所長，是推進教育改革的關鍵。

二是以體驗式學習深化價值觀教育。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固然令教育越加重視學

生應用科技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導學生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確保科技發展的利器不至於傷人傷己。價值觀教育涉及認知、情感及實踐多個層面的全人教育，不能只通過個別科目傳授，相關的政策規劃也不能只停留在課堂或正式課程內容中。要讓學生更有效地加深對自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理解，並樹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教學方式必須具備體驗式和生活化的特點，令學生更能感受當中的意義。在落實「雙減」政策時，必須面對優質品德教育的追求，加強並完善價值觀教育，讓學生能夠應對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環境下的各種變化。

今次「雙減」需多管齊下，騰出空間，提升教育質量，滿足學生自主學習和個性化學習需求，必定可以成就學生的多元發展，適應時代發展。



中央早前發布「教育雙減」政策，旨在減輕中小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此舉引發環球股市震盪，海內外上市的中國教育股一度暴跌，某些概念股亦受波及。政策是否有效，不能僅看股市受影響情況，更要看社會層面上產生什麼作用。「雙減」目的從來不是「為減而減」，需要的反而是「加大」和「加強」在教育上的公共投資及供給，如此才能令教育質素和標準提高。

教育部辦公廳8月開展有關「基礎教育精品課」的遴選工作，對內地教育機構的運作固然帶來改變，但同時明確以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為下一代帶來「更好、更高的教育」。怎樣才算得上「更好」？筆者認為有以下兩個範疇：一是成就下一代多元發展。中國人傳統思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應試

楊育城 九龍東潮人聯會會長 港區廣東省政協委員

「支聯會」打着所謂「愛國民主」的幌子，實則與反華勢力勾連密切，多年來踐踏國家主權和安全，持續反中亂港，積極參與修例風波，亦是違法「佔中」的幕後推手，煽動青少年走上歧途，製造社會撕裂和仇恨，挑戰中央原則和香港國安法的底線，嚴重破壞「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破壞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更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警方國安處要求「支聯會」配合調查和提供資料，做法合情合理，「支聯會」拒絕提交資料，是死性不改、知法犯法，蓄意挑戰香港國安法，罪加一等。

事實證明，「支聯會」作為外國代理人，主席李卓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翌日仍透過網絡參加美國國會聽證會，請求美國制裁香港，副主席鄒幸彤長期擔任「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執委及公司董事，透過收取美國政治黑金，多次舉辦非法集會、煽動暴力對抗，協助外國組織干預國家和香港事務，嚴重損害國家和香港整體發展利益，以上種種行徑，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分裂國家罪」。「支聯會」的違法行徑，引起社會對它的聲討與日俱增，香港市民對遏止反中亂港行爲的訴求也越發強烈，警方日前拘捕「支聯會」骨幹成員及搜查其辦公地點，保安局建議啟動程序解散「支聯會」，符合社會的主流意願。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有法必依，全港市民絕不容忍一切踐踏法律的行徑，絕不放过任何違法分子。香港國安法利劍出鞘，必定掃除國安隱患，嚴懲反中亂港分子，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穩定。我們堅信，在警方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任何反中亂港團體都將被嚴懲，走向滅亡。國家「十四五」規劃藍圖已經為香港的發展指明方向，香港應把握機遇，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繁榮發展的良好契機，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支聯會」死性不改罪加一等



李梓敬

本港房屋供應不足，引中各種社會問題，同時牽動國家領導人的心。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研討會上表示，期盼當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時，香港將告別劊房與籠屋。

有關講話反映香港國安法維護了香港社會大局的穩定，讓香港可以聚焦發展經濟、民生。接下來最迫切要解決的是房屋問題。對於這個目標，香港社會當然舉手贊成，但這些「老大難」問題，解決難度都很大。多屆特首都曾經表示過「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但劊房數目卻有增無減。至今仍有逾20萬基層市民居於劊房，對於號稱國際都會、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確實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改變當前狀況，必須擺脫長期以來因循守舊的思維和工作方式，必須拿出破舊立新的勇氣和決心，從不同途徑加快地建屋。坊間過往曾提出不少建設性的建議，例如開發棕地或郊野公園邊陲土地、讓出葵涌貨櫃碼頭土地建屋，這些建議都值得特區政府作進一步研究。

本港樓價高企，年輕人置業困難，成為無殼蝸牛，使他們對香港失去歸屬感，並形成社會隱憂。針對這個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於2017年提出「港人首次置業計劃」，旨在私人房屋之下、居屋之上，新增一個房屋層級，以豐富置業階梯。「首置」盤以市價七折至八折發售，讓年輕人較容易成為業主，計劃同時設下轉售限制，「首置」業主不可在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的五年內出售或出租單位，以精準幫助有真正置業需要的年輕人，而非把單位落於志在短期牟利的炒家手中。

「首置」計劃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所設計的樓盤較能貼近市場需要，質素也較房委會自行興建的樓宇高，可滿足收入水平較居屋入息及資產上限的市民需要。

事實上，「首置」盤推出以來，坊間反應熱烈，可見市場上有一定需求。政府確有需要加推「首置」樓盤，以協助解決年輕人置業困難的問題。毫無疑問，本港面對不同的住房問題，特區政府需要多管齊下，尋找合適的解決方案。推行過程中，或遇上不同問題，但集合民間智慧，問題並非難以解決。內地能消滅數億人的貧困問題，香港也能消滅劊房、籠屋，讓基層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同時能讓本港年輕人置業安居，建立自己的安樂窩，相信這亦是不少港人的心聲。



首置計劃有效解決置業難題